



陈登科

俯仰集

俯仰集

陈登科

花城出版社

俯 仰 集

陈登科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 州 市 大 沙 头 四 马 路)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屋 发 行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625印张 1插页 120,000字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9,000册

书号 10261·457 定价 0.76元

DEU/09

目 录

陈登科《俯仰集》前言 廉 潤 1

思怀篇

难忘的战友——马敬铮同志	10
信念——访丁玲	20
塔在人心永不倒	33
忆念赵树理同志	39
又见七女到人间——兼忆严凤英	45

旧地重游——阜阳随感

前言	50
迎头一棒	52
光棍村	56
三访羊小寨	59
还债	63
英雄不减当年	68

找小姐 74

孙马庄新貌 79

春天的欣慰——阜阳纪行

春风荡洪河 88

麦浪泛小黄 92

旧友相叙 95

重游旧战场

碾庄途中话碾庄 102

尖谷堆下遇知音 108

胜利村上访旧址 114

陈官庄上看新景 118

访澳见闻

序 122

绿树丛中点点红 123

小鸟的天堂 128

罗仁斯太太 131

走访曼南村 135

诞生公社 140

一次家宴上 145

夜生活 149

半小时的旁听 154

一条鱼一千金币	157
笑话鸟	159
时间虽然很短	164
缅怀祖国	171
牧场一瞥	178
牧师和他的两个女儿	186
悉尼街头拾零	191

生活与实践——我最宝贵的老师

——给《解放军报》通讯员同志的一封信 197

陈登科《俯仰集》前言

康 灌

陈登科同志《俯仰集》的汇编稿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实在制不住心潮起伏，久久难平。

我想起一九六八年，正是内乱的高潮上。一次我们几个“黑鬼”接受大会批斗后，被“勒令”互相监视着穿街过巷回牛棚。我们在拥挤的人群中穿行，当然也互相信照不宣地都要顺眼看看路旁的大字报和“外地来电”，同时自也互相默契着不能看得太多太久。正是那一路匆匆的瞥视，我从一条“北京来电”中，发现江青点名宣布了陈登科是“特务”。这在我当时虽已近乎麻木的心灵上，仍不能不激起波澜。

有的朋友替我担心，说我又多了个“黑关系”，更复杂了。并问我，在同陈登科的交往中，有没有发现过什么可疑的线索。因为这几个朋友都还可靠，于是我讲了一遍：陈登科最早是新四军的战士，也当过通讯员，后来认字、学文化，从给报纸写小结、小故事、小散文，到写出小说《杜大娘》时

自己还不知是小说；他把小说《活人塘》寄给赵树理以后，赵看了十分兴奋，找田间和我看，同我们商量修改、发表；丁玲同样称赞他的创作，正好丁玲同志主持并邀田间、马烽和我参加创办了文学研究所，赵树理同志就如引路人一样推荐陈登科来所学习，而丁玲同志从此便不断给他以启蒙和帮助；周扬同志看了《活人塘》也很高兴，当时他正主编《人民日报》的副刊《人民文艺》，就让我写了一篇《陈登科和他的〈活人塘〉》在副刊上发表了，以后又不断关心。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时周扬同志更给了陈登科以政治上的保护。至于我，在赵树理再三要求下初看《活人塘》时，还因字迹难认而不耐烦，不想看，直到看了三分之一才拍案叫绝，此后并和陈登科成了亲密战友和同志，还一同访问过苏联；而他也就这样在文学道路上走下来，写了《淮河边上的儿女》、《风雷》等长篇小说，也为文艺事业的发展做了不少工作……

有个朋友感叹道：“那他怎么会当‘特务’哇？”

这当然是无人回答也不须回答的。又有个人说：

“不过他同文艺黑线的‘黑关系’也够呛了！”这位朋友摇了摇脑袋，“其实他怕还只能算个土作家。”

土作家，对陈登科同志来说，称呼自然是比较恰当的。不过即使在当时，我也曾对朋友们说，陈登科这人勤于学习，勇于探索，敢于钻研，因而进步、发展、提高颇快，足见他的“土”并不狭隘；但他又一直保有着“土”的根基，而这当然是最宝贵的……

当时，上面这场谈话未免太不合时宜，很快就有朋友提

醒，便匆匆结束。直到整整十年之后，一九七八年，我才又在北京见到陈登科同志。这时我们都已不复壮年，而是年近花甲，经内乱摧残并都有病。不过他身体仍然结实，还发了胖；更重要的是言谈中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听来他不仅仍在勤奋写作，而且对整个文艺事业的发展比之过去要更为关心，显然是我们文艺界拨乱反正大军中的主力战士之一了。这使我振奋，促我学习。不过这前后也曾听到个别议论，说陈登科这人“土”气少了，“洋”气多了，甚至还带了点什么思想解放“过头”的“邪”气。但事实到底怎样？我当时和以后几次见面都没问他，因为问也多余，关键在看实践，看行动。不用说，这几年我也就对陈登科的行止多少有所留意，尽管我并不相信一个出身于游击队工农战士的同志，象我多年接触过的陈登科那样，在受到江青长时期的严酷迫害、诬蔑之后，竟还会出现什么“洋”和“邪”，然而这总不妨碍我对一位老战友忽然要稍加关注吧。

事实果然如我的不相信。陈登科同志这几年写了《破壁记》，写了《赤龙与丹凤》，也发表了一些言论和散文。我看了一些，并听到过若干反映。这之间他虽也不无缺点，但都不过如我和别的同志一样，谁能保证做到万无一失？至于在总的方面，我了解到的陈登科同志，实在是宝贵的“土”气依旧，同时又不断发展、提高，日趋成熟；而且，不论创作和工作，都比我精力旺盛并给我以激励。若论什么“洋”和“邪”气，统统都显然只是出于误解乃至个别或出于某种其它目的的无稽之谈。仅仅这本《俯仰集》中的文章，便可十足证明这

一点，更可消除种种误解，尖锐反击那或出于某种目的的个别之论。

什么叫“土”？为什么“土”气宝贵？我以为，“土”气就是我们革命队伍的优良传统，就是我们的革命起于农村并因而深深浸透于工农兵群众之中的根基，这是几十年前仆后继的艰苦斗争以及无数血汗和生命逐步换来和积累的，是我们头等珍贵的传家宝。任何一个革命者如果丢掉了它，就是忘本、倒退；即令对它稍有疏忽，也是危险的。我记得三十年前，丁玲同志曾经对陈登科的创作谆谆告诫过这一点。而《俯仰集》的作者也并没忘记这一告诫，集子中的一篇文章里还提到过此事。这能说陈登科同志会有丝毫的忘记过去，或“土”气少了么？

何况更重要的，还在这个集子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陈登科同志近年间或深入农村，或遇见老友，在尽情描画今天新的生活和新的喜悦之余，也同时涉及忆旧、怀旧之作；其中对历史传统和斗争陈迹都无不满怀眷恋，情挚萦回，反映了一个革命作家的本色不仅没有稍失光辉，而且随着时间的增长而色泽愈新愈艳。这就是说，陈登科确是“土气”依旧，并且日益光鲜。

至于革命作家这种固有的本色和光辉，如前所述是来于生活的根基，即来于党和人民的哺育。集子中正是反映了作者发自内心地深深牢记这一点，因而对自己的启蒙老师、历尽艰苦磨难而仍然健在的和创作力旺盛的丁玲同志，是那样情深意重，并把她永折不弯的乐观和信念描绘得活灵活现，

不仅表现了作者深受教益，也带给了读者难得的教益。对周扬同志同样是衷情难忘，关怀眷念。对自己的引路人、被迫害致死的赵树理同志，与战友、同志、黄梅戏著名女演员、同样被害去世的严凤英同志，以及其他患难中的老友，陈登科笔下也是深长的情意和痛切的追怀交织，使人感慨绵绵。尤其是再访淮海战役时的碾庄，与重游五、六十年代工作过的淮北，那不论对李大娘的深入访问，或千方百计寻找老刘和小妞的经历，更突出表现了作者同工农群众之间血肉一体、冷暖交融的深厚情感。至于作者去亳县农村“还债”，又突然意外得使人振奋和惊讶不置，似乎高尚的心地和美德不断在升华。

陈登科受迫害十多年，坐牢就坐了五年，人未亡而家曾破，辛酸苦水吐不完。然而他很少写到个人的苦难辛酸，仍旧坚持下乡和写作。他的笔又不忘歌颂三中全会后农村新的气象，新的人物，不忘过去穷困的乡亲。特别是不忘六十年代初期，自己在农村工作时执行“左”的政策所“欠”下的“债”。不论是社员是干部，只要他曾错误批评过，就都要找上门去，道歉，还债，检讨。当然这是革命者的本色，是党的传统作风。问题是十年内乱以后的这些年，不是谁都见过一些老中青的各部门负责人，他们出来工作较早，也都是好同志，但却今天执行过评法批儒，明天又执行调动积极性，或又今天批走资派，明天再否定批走资派么？这些同志至今仍在负责岗位倒是可以的，其中有的并已做过检讨或表示过认错的态度，得到了群众谅解和拥护。但也有某些同志，只叫

别人检讨，自己则俨然一贯正确，无动于衷；谁若婉转问问他，他反倒说道：“我只是执行问题，当时你若处在我的位置，只怕你比我执行得还厉害！”然而陈登科一点点执行上的错误，为什么受尽折磨而仍然不忘，只有主动还了债才安心？我也是检讨过不少执行中的错误的，并且今后还要检讨而始终不悔。同时，我也不要要求俨然一贯正确者非还债不可，只是从革命者的本色来看，和俨然一贯正确者相形之下，总有点差距吧！点点差距也无妨，但如果这样的中青年同志要列为接班人，那我就难免要有所担心，也恐怕他们终难通过群众的检验的了。

正因为如此，就使我感到仅仅从陈登科的还债，也足见他这本集子对我们党风的整顿，都是不无裨益的。因而如果说他是个“土”作家，那就不仅土气依然，而且还更加厚实，更有深化，总之是更趋成熟了。显然这不只是陈登科同志个人的成就，也是同党和人民乃至同碾庄的大娘、淮北的小妞以及周扬、丁玲、赵树理同志的影响分不开的。

不过成就的由来，主要自还靠个人的努力。陈登科同志一方面是工农泥土中的根基深厚，这当然是主要的方面；另一方面，从这本集子，也可看到他一直在奋力从思想、理论和艺术上不断追求提高。

陈登科同志土厚根深，而又勤于钻研和不断奋然向上，这实在使我激励，促我长进，同时艺无止境，我们当然都还需要不断深入工农群众，攀登艺术高峰。我这次应约来安徽，从陈登科身上受到鼓舞，更通过他而得见李白吟诗的采

石，人间灵秀的黄山，近代、现代、当代光华荟萃的人文，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首先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滁县地区农村风物，这所有一切，莫不都在为四化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而竭力以赴。我当然也同样心事急，性怀切。趁着陈登科同志要我在他这本集子前面写一篇文字的机会，我匆匆下笔，丝毫不想一貫正确，只盼能屡有上进，以便同陈登科和文艺界所有同志一道，在创作上和对整个文艺事业上，奋力求得有所作为。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六日，马鞍山

思 怀 篇

难忘的战友——马敬铮同志

谁要是翻开我的履历表，一定会奇怪，马敬铮同志怎么会成为我难忘的战友？马敬铮同志出生于河南安阳县，我是生长在江苏涟水，我们两个人相距千里，从未在一起工作过，何以成为战友呢？不！我们是战友，是战友！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他不仅给我精神上重大鼓舞和支持，而且在我最危急的关头，他冒着风险，抢救过我的生命，这难道还不能称为战友么？应该说，他是我终生难忘的最亲密的战友。

马敬铮同志是一九六二年调来安徽的，我们虽是同住在合肥市，由于工作性质不同，并没有过任何接触，当然也就谈不上相识二字了。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我被叛徒江青诬陷为“特务”，关进监狱。因为我是“旗手”江青点的名，又是狗头军师张春桥指使逮捕的重大政治犯，在他们私设的监狱里所受的待

遇，当然也就非同一般。

我住的是单人独间。能见到人间世界的唯一渠道，是门上八寸见方的小窗。

通过小窗，可以看看走廊，却看不到左右房间，更难得知两边邻居，是何许人物。在一个礼拜一的中午，因烧饭的大师傅休假，便由劳改犯人送饭给我们。这个劳改犯人，约三十来岁，走到我的窗口，给我两个山芋面窝窝头，我退了一个给他，向他多要了半碗菜汤，我刚刚坐到铺上，突然听到隔壁窗口，劳改犯人大耍起威风，喝令道：“站好，你知道不知道监狱的规矩啊？这是马厅长从前规定的，一人只准吃两个，你为什么要吃三个？呸！三多病，四多病也不行。没有想到你也有今天吧？告诉你，就是要你尝尝这里的滋味。嘿！今天嘛，嘿，嘿……”

我一听到那劳改犯人险恶的冷笑声，赶快跑到窗口去，侧起耳朵，静静地听，但始终未能听出隔壁房间里的说话声。

“是谁？这个劳改犯人，有时还主动多给我一两个窝头，为啥对他这么凶狠呢？”我暗暗在猜想，但我始终未想到，我的邻居就是原公安厅厅长马敬铮同志。

好打听是非，对我来说，是职业性的毛病。终于从烧饭的大师傅口中得知，马敬铮同志和我的遭遇，虽不尽同，但也是由于那个“旗手”“砸烂公检法”而被指陷为“特务”后关进来的。这一点是相同的。马敬铮同志在进监狱之前，就患有肝炎和“三多病”。所谓三多病，就是糖尿病；得了糖尿病的人，较一般人吃饭多，喝水多，小便多。烧饭大师傅知道他